

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长江流域

CHANG JIANG LIU YU

学术文化的近代演进

XUE SHU WEN HUA DE JIN DAI YAN JIN

◎ 罗福惠 许小青 袁咏红 著

 武汉出版社

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
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长江流域学术文化的近代演进

罗福惠 许小青 袁咏红 著

武汉出版社
2007年·武汉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江流域学术文化的近代演进/罗福惠,许小青,袁咏红著. —
武汉:武汉出版社,2007.9

ISBN 978 - 7 - 5430 - 3746 - 5

I. 长… II. ①罗…②许…③袁… III. 长江流域 - 文化史 -
近代 IV. K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2122 号

书 名:长江流域学术文化的近代演进

著 者:罗福惠 许小青 袁咏红

责任编辑:王远彦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wuhanpress@126.com

印 刷:武汉市勘测设计研究院地图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17.25 字 数:448 千字 插 页:4

版 次: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2.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 录

导言:学术前史与本书旨趣	(1)
--------------------	-----

第一章 晚清江南经学家与学术文化

第一节 江南经学家的家世与学术	(10)
(一) 世家与地域学派在近代的延续	(10)
(二) 后起的经学世家	(19)
(三) 经学世家的家学传承	(23)
(四) 宦宦之家的经学家	(27)
(五) 书香之家的经学家	(36)
第二节 江南经学家的家法、学派与地缘	(41)
(一) “家法”与“学派”评说	(41)
(二) 晚清经学家的家法主张	(51)
(三) 地缘与学术	(59)
第三节 江南经学家的学术交往圈	(69)
(一) 江南学术圈	(69)
(二) “相约各治一经”	(72)
(三) 江南官书局与江南经学家	(76)
(四) 孙诒让与江南学术圈	(82)
(五) 章、刘交谊与古文经学	(88)
(六) 章太炎的师友门生与经学	(98)

第四节 江南经学家与西学及其学术贡献	(103)
(一) 并非附会地学习西方	(103)
(二) 文化回归的旗帜	(108)
(三) 江南经学家的学术贡献	(114)

第二章 湘鄂川传统学术的演进

第一节 多种传统学派的并存之局	(128)
(一) 晚清理学在湖南得势	(128)
(二) 理学在湖北的延续及所遭批判	(134)
(三) 今文经学在湖南、四川的传播	(143)
(四) 考据、训诂之学的燔火	(161)
第二节 传统学术发展的内在思想动力	(184)
(一) “经世致用”的驱动与分途	(185)
(二) 民本观念的发展及其近代意义	(201)
第三节 新旧书院:艰难蜕变的学术基地	(216)
(一) 书院的延续与蜕变	(216)
(二) 书院内外的风波	(234)

第三章 清末民初长江流域的学术团体

第一节 梁启超、章太炎、谭嗣同与近代文化社团	(250)
(一) 连续三篇文章为学会呐喊催生	(251)
(二) 学会背景下的学术研究	(257)
(三) 学术观念上的歧异与人事纠纷	(266)
第二节 戊戌时期南学会之“会”与“学”	(276)

(一) 南学会之“会”	(276)
(二) 南学会之“学”	(292)
(三) 从南学会看戊戌时期长江文化团体的学术特征	(319)
第三节 辛亥时期的国学保存会	(324)
(一) 国学保存会成立的背景与学术动机	(325)
(二) 国学保存会的学术主张	(329)
(三) 国学保存会的学术成就	(345)
第四节 五四时期的学衡派	(355)
(一) 学衡派的性质	(355)
(二) 学衡派学术观的主要特色	(359)

第四章 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与民国 20—30 年代的学术文化

第一节 南方学术中心——国立东南大学的建立	(371)
(一) 东南大学国立化	(372)
(二) 人文与科学并举	(389)
第二节 东南学派与南北学术文化论争	(399)
(一) 《学衡》与南北学术文化论争	(399)
(二) 从“国学研究会”到“国学院”	(414)
第三节 政治变动下的中央大学与文化建设	(424)
(一) 首都最高学府的设立	(424)
(二) 罗家伦与创立有机的民族文化	(431)
(三) 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平衡	(448)
第四节 中央大学与 30 年代民族危机下的政治文化	(466)
(一) 《时代公论》社与政治文化参与	(466)

(二) 文化民族主义与《国风半月刊》	(481)
--------------------------	-------

第五章 民间学会与官办学术研究机构的比对

第一节 复返先秦:章氏国学讲习会	(491)
(一) 章氏国学讲习会的缘起	(491)
(二) 课程设置及特点	(500)
(三) 阐扬“儒行”与“求是”理念	(509)
(四) 先秦的形式与创新的内容	(514)
第二节 创建典范:历史语言研究所	(517)
(一)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建	(518)
(二) 学术环境与氛围	(521)
(三) 傅斯年与史语所的研究取向	(527)
(四) 学术典范与传承	(533)
后记	(545)

导言：学术前史与本书旨趣

就地域空间而讨论文化问题,兴起于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其目的既在于体现中国文化的丰富多样,也是有感于一些冠以“中华”、“中国”字样的文化研究著作所涉及范围太大,实则仍是选取历史上引人注目的某些时段、某些文化派别甚至某些重要文化人物加以研究,由于篇幅限制,对很多地域性的文化现象无法深入探讨。所以,80 年代,各地出现了一批从宏观上研究地域文化的著作和论文,诸如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湖南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关中文化、中原文化,等等。此类作品多谈古代文化的内容和地域特色,对于近代只是略有涉及。

明确以长江流域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有李学勤、徐吉军主编的《长江文化史》。这部由 16 位专家学者通力完成的近百万言专著,第一次系统全面地讨论了长江流域从史前时期直至近代的历史文化渊源、发展、演变及各种成就,肯定了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首次揭示出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同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长江与黄河一样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之地。惟近代部分的篇幅,仅占全书的十二分之一。刘锡汉、李宗琦主编,8 卷 64 编、1500 万字、3000 余幅图片的《中华长江文化大系》,从长江流域的自然和人文地理、商贸交通、工艺服饰、科学技术、文学戏剧、民俗风情、岁时节令、宗教信仰、军事政治等方面入手,对长江

文化作了全面、生动的介绍与剖析，可说是一部长江文化的百科全书。不足之处是这部“大系”过于偏重“物质”的或“物化”的文化，对民俗与大众文化也相当关注，但对历代精英人物的思想、学术却涉及有限。

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由季羨林先生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长江文化研究文库”（共计划出 50 册，现已出近 40 册）特地设有“学术思想系列”，对长江流域的文学、史学、哲学、理学、朴学、近代思潮等，均组织专家作系统研究，特别强调各种专门之学发展变迁的内在理路，以及进入近代之后所受到的外来文化的影响。

近几年来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极为活跃，所以关于长江三角洲的各种经济生活、城镇发展，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乡村社会、宗族制度等问题的研究之作不断涌现，这些研究虽不直接探讨文化问题，但应该视为文化的背景或基础。还有关于历代长江流域学者、学派、书院，以及近代以来的各种学术团体、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的有关专著和论文，更直接与本课题的内容有关。

由于本书的内容主要是探讨长江流域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发展与演变，传统文化在这里又主要指精英人物的经史之学，而在我们的思考中既试图把学者所处的环境条件——如出身家世、所属地域学派与师友交往、所在书院、学会、学校及研究机构等外在的因素作为观察的视角，又把学术的内在理路，诸如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的演变，学科体系及学术成果形式的变化等作为需要兼顾的内容，故所涉及的前之研究成果无疑很多。为了不让学术前史过于宽泛而使读者生厌（尽管研究者觉得必要），这里只拟围绕有关近代长江流域的文化世家、地域性学派、书院与学会，有关大学及研究机构，还有若干学者个人，以及相关论及学术研究的范围、方法、学科体系等问题，选取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主要的或最重要的整理或研究成果，在归纳为下述几个问题的范围内，加以必要的介绍。

（一）有关文化世家、地域性学派的研究

近代文化世家多见于江浙，不过已开始式微。有关文化世家和著名学者的基本史料，最为集中和系统的，还是徐世昌辑《清儒学案》和杨向奎主编的《清儒学案新编》，以及支伟成的《清代朴学大师列传》。还有近代学者如龚自珍、魏源、杨守敬、章太炎、刘师培、蔡元培、胡适等人的全集、年谱、传记等。当然这些属于基本史料。对近代包括长江流域精英文化在内的整体性的学术史研究，首先自然要数梁启超和钱穆两人均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题的两本书，前者还有《清代学术概论》，均属于20世纪前半期影响较大的研究成果。稍晚研究湖湘文化的则有钱基博的《近百年湖南学风》和李肖聃的《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的“旧籍新刊”把两本书合印为一本出版）。到60年代，张舜徽先生有《清代扬州学派》出版。

80—90年代以后，涉及长江流域学术文化研究的成果，有美国历史学家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著、赵刚译的《从理学到朴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和《经学、政治与宗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主要是从社会史和政治学的角度，研究清中叶以后江南地区的理学、考据学、常州今文学派。以一个西方学者的中文功力，要能正确解读众多学者的原著，自然有许多不足，但他的研究视角与方法确有给人启发之处。杨念群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把地域背景和知识群体互动纳入学术近代化的范围加以考察，在思考和表述上都具有自己的特色。江庆柏的《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突出了江南文化世家的学术影响。王俊义的《清代学术探研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陈其泰的《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则分别是宏观的学术、思想研究与对具体的一个学派的研究。

研究湖湘文化的成果在90年代以后不断出现。主要有周秋

光的《湖湘文化纵横谈》(湖南大学出版社 1996 年)、郑焱的《近代湖湘文化概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庾建设主编的《湖湘文化论坛》(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2)、朱汉民的《湖湘学派史论》(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4 年),以及丁平一的《湖湘文化传统与湖南维新运动》(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研究清代以来湖北学术史的则有罗福惠的《湖北近三百年学术文化》(武汉出版社 1994 年)。这些作品发掘出较多不为人知的学者文集,使两湖地区的学术文化研究不够的局面开始发生转变。

(二) 有关长江流域学者个人的研究

以清末民初的学者个人为研究对象的成果最多。仅以本书将要涉及的人物为范围,主要就有:唐振常的《章太炎吴虞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李润苍的《论章太炎》(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王汎森的《章太炎的思想》(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1985 年),唐文权、罗福惠的《章太炎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年),汪荣祖的《康章合论》(台北联经出版社 1988 年)与《章太炎研究》(台北李敖出版社 1991 年),章念驰主编的《章太炎生平与思想研究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与《章太炎生平与学术》(三联书店 1988 年)等。有关刘师培、孙诒让的研究也开始启动,对前者已有多篇研究论文,如方光华的《试论刘师培对〈左传〉的整理和研究》(《孔子研究》1995 年第四期),陈奇的《刘师培的后期经学》(《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9 年第一期),李孝迁的《刘师培与近代清学史研究》(《东南学术》2001 年第四期)等。对后者则表现为重印了朱芳圃在民国年间编印的《孙诒让年谱》(收在上海书店 1992 年出版的《民国丛书》第四编),也新出了孙延钊的《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年),连同孙诒让的学术著作,为研究者提供了资料基础。鉴于对刘师培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对孙诒让父子的研究基本还未着手,所

以本书在讨论文化世家问题时，将主要以刘、孙二氏为剖析对象。

对有关其他学者的研究之作，如关于龚自珍的则有朱杰勤的《龚定庵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 1972 年），邹进先的《龚自珍论稿》（南海出版公司 1992 年）。有关魏源的则有陈耀南的《魏源研究》（香港乾惕书屋 1979 年），杨慎之、黄丽镛编《魏源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李汉武的《魏源传》（湖南大学出版社 1988 年），李少军的《魏源与冯桂芬》（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等。其他关于王闿运的有肖艾的《王湘绮评传》（岳麓书社 1997 年），关于叶德辉的有杜迈之、张承宗的《叶德辉评传》（岳麓书社 1985 年），关于廖平的有李耀仙的《廖平与近代经学》（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黄开国的《廖平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3 年），关于皮锡瑞的有吴仰湘的《通经致用一代师——皮锡瑞生平 and 思想研究》（岳麓书社 2002 年），关于黄侃的有郑远汉的《黄侃学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年），关于傅斯年的有岳玉玺、李泉的《傅斯年》（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 年）。上述成果对于这些学者个人的学术成就或思想特征的发掘、诠释都有一定深度，本书的旨趣是进一步将他们纳入到近代学术转变的共同趋势中加以考察。

（三）有关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的研究

涉及长江流域书院的研究成果则有杨慎初等人的《岳麓书院史略》（岳麓书社 1986 年），胡昭曦的《四川书院史》（巴蜀书社 2000 年），苏云峰的《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台北近代史所专刊 35, 1983 年），朱汉民等《长江流域的书院》（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年）。这些著作主要侧重于研究书院的制度沿革、教育方式等，本书则着重讨论近代学者如何以书院为依托从事学术研究，以及如何传承传统的学术文化。

关于近代学术团体的研究，首先应该提到的是郑师渠的《晚

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和《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还有沈卫威的《回眸学衡派》（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年），桑兵的《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 1995 年）等。此外关于南学会、南社、清末国学保存会、东南大学的国学研究会、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等，各有数篇研究文章。而关于此类以保存和传播学术的团体机构，是本书的研究重点之一。

有关中国大学的研究，是近十余年来的热门课题之一。几乎所有的著名大学都出版了本校的校史，如肖超然的《北京大学校史（1894—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的《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 1981 年），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的《复旦大学志》（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王德滋主编的《南京大学百年史》（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等。这些校史多由本校学者编写，往往立足于自己所在学校的立场，描述本校的制度沿革、系科设置、人事变迁，尤其是本校的“光辉历程”。站在“他者”的立场作客观研究的成果，则有苏云峰的《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8）》（台北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79，1996 年），《抗战前的清华大学（1928—1937）》（台北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84，2000 年），《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台北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82，1998 年），王东杰的《政治、社会与文化视野下的大学国立化：以四川大学为例（1925—1939）》（四川大学历史系 2002 年博士学位论文）等。综合考察多所大学，作宏观研究的成果则有陶飞亚、吴梓明的《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8 年），金以林的《近代中国大学研究（1895—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加拿大学者许美德著、许洁英译的《中国大学 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还有美国学者叶文心的《异化的大学——民国时期的文化与政治（1919—1937）》（*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

an, Harvard University, 1990)。

上述大学史的研究成果,或者属于教育史模式,多论述大学的沿革,以及教育宗旨、教育行政、教育方式的演变,等等;或者属于文化比较研究模式与现代化研究模式,揭示中国大学在中西文化交流、冲突背景下的举措;或考察教育官员、士绅及归国留学生在新式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或者属于政治与文化研究模式,着重分析大学作为民族国家建构的一部分,如何以知识和学术研究来体现其在中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价值,从政治与学术的张力中审视中国大学的独特发展道路。本书拟以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为个案,探讨该校所体现出的政治与学术的互动状况,尤着重对该校之内的两个学术团体——学衡派和国风半月刊社加以研究。

(四) 有关宏观问题、学科嬗变及方法的研究

近代长江流域的学术文化是近代中国学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虽不是专门以长江流域学术文化为研究对象,而是从更大的范围内讨论学术文化的有关成果,也对本书的写作具有借鉴意义。诸如肖功秦的《儒家文化的困境》(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8年),喻大华的《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陈平原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余英时的《文化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书店2004年),陈少明的《儒学的现代转折》(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和《汉宋学术与现代思想》(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房德邻的《儒学的危机与嬗变》(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汤志钧的《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1989年),韦政通的《中国思想传统的创造转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还有左玉河的《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年)等。

上述著作,或者分析传统学术在近代的困境与衰落;或者讨论传统学术如何从变化的时代环境及域外学术中汲取养分,通过自身的新陈代谢,使自己从内在的思想到外在的学科形成都发生现代性的变化,从而成为现代学术的一个部分。具体地说,传统学术不再仅以“四部之学”的系统存在,而是形成多维度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如哲学、文学、史学、教育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逻辑学、法学,当然更有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工学、农学、医学等“质测”或“应用”之学等。在这种知识激增、学科裂变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学术逐渐分解和变形,关涉到人文及社会内容的学术,仍然较多地体现在哲学、文学、教育、社会、政治诸学之中,而史学尤其是其中的学术史,可说是集传统学术之大成。

现代学术的建立当然更离不开学者们思想和方法的转变。自从20世纪初年章太炎、梁启超号召以“民史”代替“君史”,以“新史学”取代“旧史学”以来,中国史学发生过两次大的变化。一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是形成了一种联系的、整体的历史感和社会进化观;一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二三十年代,包括唯物史观和实证主义都在“科学方法”的名义下成为史学的主导思想和主要方法。讲究“系统”性,强调新材料,借鉴西方的类推、归纳、比较,并结合田野考察与乾嘉学派的历史考据,使得史学的精神旨趣、研究方法、著述结构及文字语体都产生了极大改变。体现在学术史的研究上,研究者们不仅既要作文本解读,还要注重对政治、社会环境的理解,对学者之间的交往联系以及把他们集聚一起或区隔开来的种种因素,包括学术渊源,思想信仰,所在地域或所属机构(书院、学会、学校、研究所等),都加以联系的考察。

按照施坚雅(G. W. Skinner)的区域发展理论,在明清以来中国的九大区域中,长江流域即占三个(即下游、中游、上游)。因此研究长江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与国内其他区域乃至国外的

诸种联系，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本书是对近几年兴起的长江流域研究热潮的一点响应，它主要讨论传统学术问题，通过一系列的个案研究，既从这一地区前后赓续的学者群体及其成果的层面，又从学术世家、地域性学派、书院、学会、高等学校及有关讲习会、研究所等社会组织的层面，回顾百余年来传统学术本身及其赖以传播和传承的条件变化，其意在于探讨学术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和学术演变的内在理路，包括学术范围从四部之学到多向量的近代学科体系的发展，学术研究机构从“家学”、书院、官书局到学会、大学和研究所的变化，研究方法从传统单一的考据、文本解读，到考察学者作为个体的人如何“社会化”，以及这种“社会化”对他们的学术研究怎样发生影响等。这样一种思考路径，在以往的研究中并不多见。惟其如此，我们的这一工作只能说是初步的探索和尝试，既希望得到读者和专家的批评帮助，我们自己今后也将继续努力提高和深化这种研究。

第一章 晚清江南经学家与学术文化

第一节 江南经学家的家世与学术

江南为近世中国的人文渊藪，学术文化极为发达，清代的经学学术也主要集中于江南地区。晚清江南经学家或出身于经学世家，或出身于宦宦之家，或出身于书香之家，生长于丰厚的家学文化氛围之中，有着良好的经学文化积累与初步的学术训练；他们继承了乾嘉以来的学派家法，以其为门径进行艰苦探索，使晚清经学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一）世家与地域学派在近代的延续

清代江南学术世家的繁盛是学术文化的一大景观，也是其学术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经学世家世代相承，如吴派经学开创者吴县惠氏即是惠周惕、惠士奇、惠栋三世相传，常州今文派开创者武进庄氏亦是庄存与、庄述祖、庄有可、庄绶甲三代相继，其他兄弟相磋、父子相承的经学世家也不胜枚举。他们以家学相承，不断发展，将清代的经学研究推向超迈汉唐的鼎盛时期。其流风